

海外上海研究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TREACHERY, SUBVERS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美]华百纳 (Bernard Wasserstein) 著
周书垚 译 周育民 校

上海秘密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谍战、阴谋与背叛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上海秘密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

[美] 华百纳 著

周书珏 译

周育民 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美) 华百纳著；周书珪，周育民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书名原文：Secret War in Shanghai: Treachery, Subvers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SBN 978 - 7 - 5520 - 0921 - 7

I. ①上… II. ①华… ②周… ③周… III. ①抗日战争—间谍—情报活动—史料—上海市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8310 号

SECRET WAR IN SHANGHAI

by Bernard Wasserstein

Copyright © 1998 by Bernard Wasserstein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

著 者：华百纳(Bernard Wasserstein)

译 者：周书珪

校 译 者：周育民

责任编辑：曹艾达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1.25

插 页：2

字 数：278 千字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0921 - 7/K · 280

定价：3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缩略语及人物表

缩 略 语

CCG	China Commando Group (British) (英国)中国突击队
KMA	Kai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 开滦矿务总局
OM	Oriental Mission (Far East section of SOE) “东方行动”(英国特勤部远东分部)
OS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A) 美国战略情报局
RII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i>or</i>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Institute (Chinese) 中国调查统计局
SACO	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中美合作所
SIS	(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 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
SMP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
SOE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British) 英国特勤部

脚注中使用的缩略语

AA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Bonn 德国外交部档案
AMAE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Nantes 法国外交部南特档案馆

BAP	Bundesarchiv, Potsdam 德国联邦档案馆
CAHJP	Central Archiv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Jerusalem 耶路撒冷中央档案馆犹太人历史档案
CIC	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 反间谍部
FOIA/CIA	Documents released to the author by the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美国中央情报局依《信息自由法案》 ^① 对作者开放的文件
FOIA/FBI	Documents released to the author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美国联邦调查局依《信息自由法案》对作者开放的文件
FOIA/SD	Documents released to the author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美国国务院依《信息自由法案》对作者开放的文件
FOIA/USAISC	Documents released to the author by US Arm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依《信息自由法案》对

① 美国《信息自由法案》于1967年施行，以后又数经修订，规定除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信息、纯属机构内部人事规则和制度的信息、法律公开保护的信息、商业金融机密信息、可能超出法律诉讼范围的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的信息、执法记录、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调查报告、特殊地理信息9种信息之外，所有美国政府机关的档案都得应公民和公私团体之查询申请予以开放，并提供便利查询的条件。联邦法院须尽速处理因申请拒绝而引起的诉讼。美国《信息自由法案》对政府信息的管理和公开、社会公私事务的协调和管理、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学术研究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译者注

	作者开放的文件
HIA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ornia 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
IOR	India Office Records, British Library, London 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档案
JFM	Captured 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 records (microfilms),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美国国会图书馆外交部日俘档案(缩微胶卷)
PRO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英国国家档案馆
RSHA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党卫队国家安全部
SMP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record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ryland (Record Group 263) 美国国家档案馆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档案
SOA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USNA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ryland 美国国家档案馆

人 物 表

像 O. 113 这类数码代名系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战时使用的。这里列举的其他化名或是来自敌方或友方起的绰号,或由派遣情报机构起用,或是罪犯用的假名。本书中的中文名字根据当时流行的威妥马拼音字母译出。

贝里埃(“伯爵”Berrier, Hilaire du, 美国人): 冒险家、飞行员、新闻记者, 在上海活动的日本特务。

艾森恰格(上校 Eisentraeger, Lothar, 德国人): 德国纳粹反间谍机构官员, 亦名 Ludwig Ehrhardt; 1942—1945 年任纳粹反间谍部上海站站长。

厄本(“医生” Erben, Hermann, 澳籍美国人): 冒险者和随船医生(无证书)、猴子专家, 弗林(Errol Flynn)及米奥雷尼(Dr Albert von Miorini)的朋友; 战争期间上海德国特务机关的低层特务。

甘德(Gande, W. J., 英国人): 酒商; 1941 年任英国特勤部远东分部上海组组长。

卡纳(Kahner, Major Gerhard, 德国人): 警察; 1940—1943 年为上海盖世太保头子。

肯特威尔(Kentwell, Lawrence Klindt, 英籍中国人): 吊销执照的律师和新闻记者, 亦名“甘德云”、“甘维露”; 太平洋战争期间为日伪政权立法院成员。

约翰·恺自威(Keswick, John H., 英国人): 亦名 O. 113 和 AD/O; 上海怡和洋行大班; 1942—1945 年为英国特勤部高级官员。

托尼·恺自威(Keswick, W. J., 英国人): 亦名“托尼”(Tony)和 AD/U; 约翰·恺自威的哥哥, 怡和洋行大班; 上海工部局总董; 战争期间, 任英国特勤部远东分部督导(在伦敦)。

柯勒里(Killery, Valentine St John, 英国人): 商人, 亦名 O. 100; 战时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ICI) 远东首席代表; 1941 年 5 月—1942 年 6 月任英国特勤部远东分部部长。

梅辛格(上校 Meisinger, Josef, 德国人): 战犯; 1941—1945 年为德国远东党卫军头子。

梅乐斯(Miles, Milton, 美国人): 中将, 后升为上将, 海军军官, 亦称“Mary”、“Trout”和 O. 610; 1942—1945 年任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国处处长。

米奥雷尼(Miorini, Dr Albert von, 澳大利亚人): 医生、勒索者; 战前和战时在上海的形迹可疑者。

莫伊(Moy, Herbert Erasmus, 华裔美国人): 播音员; 战时先后在德国和日本的上海电台供职。

那森(Nathan, Edward Jonah, 英国人): 商人; 1943 年 2 月以前任开滦矿务总局总经理。

大谷稻穗(Otani, Inaho, 日本人): 日本公使海军参赞; 1941 年 8 月起任日本海军情报局外事处上海站站长。

皮克(“上尉”Pick, Eugene, 白俄罗斯人): 演员、帮会成员和政治冒险家; 原名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可耶维诺可夫(Evgeny Mihailovich Kojevnikoff), 亦名“Hovans”、“Clige 医生”, 还有其他许多化名; 战时受日本海军情报局外事处上海站雇用。

雷蒙得(Raymond, Alan, 澳大利亚人): 赛马迷; 战时在上海发起由奸细组成的“独立澳大利亚同盟”。

卢非(Ruffe, Baron, R. Auxion de, 法国人): 在上海活动的宣传者和作家。

希夫根(Siefken, Captain Louis Theodor, 德国人): 海军官员; 亦名 Smith; 1940—1942 年任德国纳粹反间谍部上海站站长。

苏玛丽(“公主”Sumaire [Rajkumari Sumair Apjit Singh], 印度人): 时装模特儿和女冒险家, 很可能是帕提亚拉邦主的侄女。

戴笠(中国人): 军统局头目, 亦号“中国希姆莱”和 O. 601。

杜月笙(中国人): 帮会分子、政客、慈善家; 1937 年以前的上海青帮头子; 战时移居重庆。

目 录

缩略语及人物表	001
缩略语	001
脚注中使用的缩略语	001
人物表	003
序	001
第一章 孤岛	017
第二章 歹徒	031
第三章 公共租界的“鏖战”	054
第四章 “静候蛮族”	091
第五章 黑暗世界	107
第六章 东方行动	127
第七章 被禁闭的鹰	141
第八章 通敌分子	171
第九章 流亡的上海外侨	213
第十章 战争中的战争	236
第十一章 游戏结局	262

第十二章 旧上海的暮光	291
结束语	319
参考书目	322
1. 未出版资料	322
2. 已出版资料	325
A. 当时在上海出版的报刊	325
B. 书籍与文章	326
后记	339

序

1937年7月7日，日本向中国大举进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的开始。这年秋天在上海的战事是这场冲突第一阶段血腥的顶点。在1941年12月以前，英美国家并没有被正式卷入其中，苏联只是在1945年最后的日子才参加进来。但实际上，主要大国从一开始就以各种方式涉足这场控制亚洲大陆的争斗之中。它们在这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因此都建立了有效的情报机构。在1939年至1945年期间，它们都在试图拓展自己的利益，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残忍的暴力，但更多时候通常采用富于心计的隐蔽手段。这场战争的战场，就是远东情报的大都会——上海。本书讲述的就是这场秘密战。它将透过谍战、颠覆、欺诈和恐怖的缝隙，深入到阴暗政治的地下层面，它制造了奇异的纵横捭阖，激起了英雄气概或变节投降，反映了国家之间在全球范围内互相角逐的微观世界。

1930至194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可怕的罪恶、野蛮的犯罪和阴险的政治，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能比这里更适于展开秘密战争了。这座中国最大、最繁华同时又最危险的城市，财富堆积而五方杂处，以致成了经济角力、观念冲突和险恶政争的屠宰场。

上海的门户洞开，招引来了一些互相敌视的异国社群：“白俄”

和“红俄”把在母国彼此的仇恨带到这里,即使流亡异国他乡仍念念不忘;德国商人在德国花园总会^①忠心为希特勒祝寿,却因数千名受纳粹迫害而流亡上海、口操德语的“非雅利安人”的人多势众而气馁;自居上流的英国“上海居留者”不得不与“巴格达犹太”^②富豪摩肩接踵;朝鲜黑帮、菲律宾艺人、潦倒的“千手”、扒手、骗子各行其道,干着五花八门的勾当。不同国籍的小姐、太太,风光不再,也操起了在花园、都城、华懋饭店^③门前招徕游客的行当,甚至在其他暧昧的场所勾搭五六种国籍的水手和军人。即使在这座城市看起来似乎高档的地段,也是纸醉金迷与穷困潦倒孪生并存。在仙乐斯夜总会^④,这座城市里第一个配备全空调的娱乐场所,英国大班和中国盗匪带着太太或情妇一起共销午夜。而在门外,身穿笔挺的制服,自称为前沙皇时代的“将军”,佩戴着成打从虹口买来的勋章的俄国门卫,却在应付着成群结队衣衫褴褛的乞丐。在乌烟瘴气的舞厅、酒吧和下流场所,坐着成排的俄国“舞娘”和中国“歌女”等待顾客“垂青”。据估计,在1935年,上海每13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是娼妓。^⑤

充斥的政治暗杀、帮会火并或情敌决斗各种暴力,始终是这座

① 德国花园总会(German Garden Club),位于茂名南路58号(原为霞飞路474号),1903年由旅沪德侨募资兴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上海法租界没收,1917年改名为凡尔登公园,向公众开放,1925年关闭,拆除另建为法国总会楼。另外,德国总会楼位于外滩,于1907年竣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对德宣战后封闭该楼,后由中国银行收买,在30年代拆除改建新楼。作者此处所谓“德国花园总会”,当为位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3号的德侨总会。——译者注

② Baghdadi Jews,亦称“伊拉克犹太人”,是分布在中东乃至亚洲的最大的犹太人群体。巴格达是古代犹太文化的摇篮,由于与伊斯兰教的宗教冲突,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流亡到国外的人数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纳粹的虐犹政策,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大批逃亡,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主要聚集地之一。——译者注

③ 花园饭店,即今国际饭店;都城饭店,即今新城饭店;华懋饭店,即今和平饭店,都位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及福州路一带。——译者注

④ Ciro's Night Club,位于今南京西路仙乐斯广场,原建筑已不存在。——译者注

⑤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1997, p. 40.

城市的威胁。法租界“血巷”(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上肮脏的铺路石也见证了外国士兵与水手不时发生的打斗。“上帝啊,是谁把上海变成了罪孽深重的所多玛和蛾摩拉!”^①一位不懈清除心魔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如是说。一位中国读者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他写道:上海在“二十四层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②

黄浦江畔名声遐迩的外滩欧式风格的银行、商行大楼,俨然坚不可摧。但这座城市的地基简直是脆弱不堪,林立的大厦不过是漂浮于泥层之上的木筏而已。

二

现代上海,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的而不是中国的产物。确实,南市的“老城厢”在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是重要的口岸和商业重镇。但城市的重大发展,开始于结束鸦片战争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根据这个条约以及之后的中美条约、中法条约,上海等一些沿海城市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并加以宽泛的解释,外国列强按照其商人的意愿在“条约口岸”逐步扩大特权。这些口岸的一些地方被辟为“租界”,由这些列强进行准殖民地式的直接统治。在这些“飞地”中,外国人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做生意,不必向中国人交纳税收,也不受中国法庭和官员的干预。不到半个世纪,上海成长为整个长江流域与世

① 所多玛(Sodom)、蛾摩拉(Gomorrah)是《圣经·创世纪》中提到的被上帝毁灭的两座“罪恶之城”。——译者注

② 引自 introduction to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1992, p. 5. (魏斐德和叶文心原著有误,此语非夏衍所说,而是读者评论;英译“a city of forty-eight-storey skyscrapers built upon twenty-four layers of hell”亦与中文“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地狱”本意不符。“二十四层的高楼”指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花园饭店。此处恢复《夏衍书话·〈包身工〉余话》所引读者评论的原文。——译者注)

界其他地方水陆贸易的交易中心。长达 35 英里的码头,可以同时停泊 170 多艘轮船和 500 多只沙船^①。中国半数以上的国际贸易都得经由上海交易。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上海已经成为世界都市的一个奇迹。作为中国最富活力的城市,也是它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枢纽,上海成了军阀在权力角逐中志在必得的皇冠上的明珠。1911 年的辛亥革命,满族皇帝被拉下了马,但取而代之的民国政府风雨飘摇。人口规模超过 500 万的上海,在世界最大城市中排行第六,是远东最大的商业中心,外国资本尤其是英国的投资趋之若鹜。

就像高卢(Gaul)^②一样,上海分割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一个主权实体,各有其政府、武装力量和警察。华界地域最大、人口最多,是中华民国大上海特别市的辖区。但这一区域,只是这座城市的外围地区。1927 年镇压共产党之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试图整合其在上海的权威。蒋记国民党想实现一党治国的目标,但它发现,虽然拥有名正言顺的主权,政令即使在华界也未必畅行。军阀、帮会、政客相互间勾心斗角,与中央政府和新式中国资本家争权夺利。所有这些都对位于城市中心的两块繁华的外国“飞地”垂涎三尺。

法租界面积较小,主要是住宅区,毗连着一段黄浦滩。在 1936 年,人口达 50 万,外国侨民只占小部分,其中法国人只有 2 342 人。俄国侨民多达 11 628 人,大部分是反布尔什维克的白俄,在俄国内战末期由西伯利亚流亡过来。英国人也略多于法国人,有 2 468 人。法租界几乎由法国总领事独裁,他在名义上由他指定的公董局协助,但他与公董们的关系就像路易十四之于凡尔赛宫廷。为维护治安,总领事可以招募 4 000 人的巡捕,其中法国

① sea-going junks, 俗称沙船,是传统中国在沿海航行的平底帆船。——译者注

② 现在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乃至德国等的广袤地区,在古代称为“高卢”,习惯上分为山南高卢、山北高卢和纳乐波高卢三大地区。——译者注

人不到 300 人,其余为越捕和华捕。法租界巡捕房设有消息灵通的政事治安处和若干腐败透顶的警务机构,这些机构借名取缔毒品和罪恶而设立起来,实际上干的多是千方百计瓜分各种不法利益的勾当。

上海的心脏是工商业中心,这里有数百家工厂,码头、仓库(货栈)绵延数英里,还有公园、娱乐场所、时尚俱乐部和饭店,以及列强的领事馆,这些东西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实体——公共租界。1936 年,公共租界的人口约有 120 万,其中外国人只有 4 万。这“一小撮”人,从租界开辟以来就是这里的统治者。

与中国其他的外国租界不同,公共租界不属于列强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租界的法源(The settlement's constitution)是《土地章程》,该章程于 1845 年由中国地方当局首次颁布,几经修订,至 1898 年最终定型。这份奇特的文件,虽然作为几个主要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的附件而生效,但仍在若干问题上含糊不清,最明显的是主权问题。尽管租界从各种实际政治意义上看确实是外国的殖民“飞地”,但凌驾其上的主权在理论上依然属于中国人。作为租界的统治机构——工部局,上受制于“领事团”(Consular Body),下受制于“纳税人”(ratepayers)。工部局董事由少数几个有身价的人组成,主要是英美人(后期才有日本人),听命于英国商行和银行的大班、大亨。纳税人每年集会一次,决定主要政策问题和选举董事。工部局总办(the council's chief civil servant)非利浦(Godfrey Phillips)^①原为剑桥联合会(Cambridge Union)主席,是上海滩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财产资格的高门槛将选举权限制在少数欧洲人手中。1935 年,在 38 940 个外国侨民中,只有 3 852

① 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原设秘书,1860 年代始设总办,代表董事会综合管理、协调下属各委员会行政工作。总裁为名誉职位。1929 年费信悖(S. Fessenden)总董卸任后改任总裁,为工部局最高行政首脑。1939 年费信悖卸任,总裁由总办非利浦接任。1939—1941 年,非利浦任工部局总裁兼总办。——译者注

人才有选举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类外国寡头有效地掌握着上海的命运。如果说,法租界是大革命前法国的海外缩影,那么公共租界就是改革法案^①之前英国的远东翻版。

立于上海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顶端的是恺自威(Keswick)家的托尼和约翰两兄弟,他们都是怡和洋行的大班。这家被苏格兰侨民称之为“muckle house”^②的怡和洋行,拥有10万雇员在其作坊、工厂和仓库工作,还有一支多达30余艘商船与客轮的船队。托尼·恺自威担任工部局总董之后,不仅是公共租界的商界领袖,而且又成了政界首脑。他的兄弟约翰在剑桥学业欠佳(三一学院荣誉历史学位考试仅列三等),但在上海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官话、沪语都能说。他的性格平易近人。有人这样描写约翰:“从他的后脑勺看,简直就像中国人的欢喜佛——福神,中国人都喜欢与他搭讪,想沾点他的喜气。有时还真灵光。”^③在上海所有时节的重要社交场合,诸如慈善舞会、总会聚餐、跑马大会乃至“猎纸赛马”(paper hunt),都不乏兄弟俩的身影。猎纸赛马是英国乡村的体育运动,在上海再次风行起来,其规则根据上海农村的地形有所变化,比篱笆更难跨越的河流是对骑手的主要挑战。恺自威兄弟在和平年代的作用,以不同形式延伸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担负起了英国在中国进行秘密战的指挥重任。

在市政事务上虽然没有政党纷争,但在租界的政治斗争依然

① 在1832年改革法案之前,英国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很高,英格兰和爱尔兰只有5%的成年男性有选举权,苏格兰还不到1%。——译者注

②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是一家在鸦片战争之前靠走私鸦片起家的老牌英国洋行,创办人为渣甸和马地臣。20世纪以后,洋行老板(大班)基本上来自渣甸的表亲恺自威家族。在上海开埠初期,怡和洋行即拍下了外滩附近的一个地块,建造洋行大楼,并不断翻建增高(今中山东一路27号)。这家洋行,中国人称之为“怡和洋行”,在中国的苏格兰侨民则称之为“muckle house”,也就是“大商行”的意思。——译者注

③ Entry on Keswick by John Swire i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1980 - 1985.

剑拔弩张。在 1930 年代,这种斗争以两种形式展开:一是外国侨民社团拒绝承认中国政府对租界拥有主权并抵制其在租界行使主权的要求;二是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族系的列强围绕租界事务控制权的冲突与日俱增。

租界虽然冠冕堂皇地称为“公共”,但工部局实际上历来大多受英国利益所左右。直到 1930 年代初,英美籍董事依然在工部局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名德国籍董事名额,战时取消,改为日本籍名额,而当时的日侨却在上海形成了最大的单一外侨社区。1927 年增设了一个日籍董事名额,但日侨并不甘休,继续要求扩大其代表权。随着其在租界中的人口与投资的不断增长,日侨显然会继续兴风作浪。至于占居民多数的中国人,在董事会中毫无发言权,直到 1928 年,才第一次在由 9 名董事组成的工部局董事会中增加了 3 名华董名额。1930 年又增加了两名华董名额。^① 为了保持董事会的非民主性质,华董并非直接选举,而是由代表富商利益的纳税华人会(the Chinese Ratepayers' Association)推举的。

租界的政治结构,体现了英国在这座城市中乃至在全中国拥有经济霸权的现实。1931 年,在全部在华外资中,英国占 30%;英国 96 300 万英镑的对华投资,有四分之三落在上海。英国控制着整个中国一半以上的航运业。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以及大部分高级职员,都是英国人。如同其他地方,英国人意识到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帝国过度扩张”的风险,于是避免直接吞并,代之以一种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模式,上海就是这种模式的翘楚。

① 1928 年进入工部局董事会的 3 名华董是贝淞荪、袁履登、赵晋卿;1929 年是徐新六、袁履登、虞洽卿;1930 年 5 名华董为徐新六、刘鸿生、贝淞荪、袁履登、虞洽卿。董事会的总人数也相应由 9 人增至 12 人、14 人。——译者注